



论《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唐黎明*

摘要 《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以学术创新为导向,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研究专著。书中的学术创新既包括言说对象的创新,也包括言说内容的创新。前者体现在积极发现未被学界当作问题进行有意识研究的内容,如对古代书目分类线性次序的分析、对同一类目中典型文献和非典型文献的区隔;后者体现在对固有问题的重新解读,如对刘向叙录“上行文书”性质的定位、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本义的重新界定等。而无论何种创新,都以古代目录和传统文化的互相映照和彼此对读为前提,因而应该说,《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是一部基于传统文化的对古代目录学理体系进行解构和重建的著作。

关键词 傅荣贤 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 目录学 学术创新

分类号 G257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9.04.015

我国有关古代目录学的研究,主要围绕《七略》《四库全书总目》等经典书目的著录、提要、分类、序言、学术功用诸方面展开,重视史料的挖掘和梳理而疏于意义揭示和理论建构,因而只是一种知性研究,其最大特点是史实描述多于意义阐释,由此导致“中国古代目录学事实上并没有被建构为一门成熟的学科”^[1]。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缺乏学术创新,研究内容和20世纪30年代刘纪泽、余嘉锡、汪辟疆、姚名达等学者所讨论的内容并无实质性区别。就此而言,扬州大学文学院傅荣贤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2]的最大价值即在于以学术创新为导向,系统研究“先儒未得而闻”的一系列目录学新问题,并最终建构了一个具有充分解释力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理体系。

1 以内容为导向的学术创新

内容决定形式。与书目的著录、提要、分类、序言等形式因子相比,内容才是第一本体,目录的任何外在结构都是由其内容特征决定的。这不仅意味着书目内容本身应成为研究的重点,还意味着对书目形式的分析也必须建立在对书目内容的认识基础之上。作者基于对章学诚《校雠通义》的解读,认为中国古代目录包括三大方面的内容:一是“甲乙部次”的技术,二是“考辨学术”的知识,三是“申明大道”的

信仰^[3]。其中,只有“甲乙部次”的技术与西方近现代目录可以相互比勘。但现代目录技术是一种理性运思,古代技术并不诉诸逻辑,因而不能确立标引和检索的相符性。而知识和信仰的内容是西方科学意义上的现代目录学所不具备的,对知识和信念的研讨也成为《研究》一书内容创新的主要方面。

1.1 “考辨学术”的知识

清人章学诚拈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直被视为是对中国古代目录最精审的概括。但学界对该命题存在明显的误读:一是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考辨具体学术;二是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的“源流”就是指学术之“史”。作者指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考辨的对象并不是具体学术,其中的‘源流’亦非泛指学术发生、发展和演化的长程历史”^[4]。章学诚旨在以“战国”为节点,区分学术的两个层次和二重境界:“源”是指遥契“三代盛时”之“道”的正面价值;“流”是指三代而后“不衷大道”的负面价值。所以,他称前者为“三代盛时”“三代鼎盛”“三代之隆”,称后者为“周衰文弊”“衰周而后”,“明于战国升降之体势”^[5]是其关注的焦点。更为关键的是,章学诚并不满足于揭示“源”“流”的不同境界,而是要通过家法还原,驱策“三代而后”之“流”返本于“三代盛时”之“道”,即所谓“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6]。由此也给

* 通讯作者:唐黎明,ORCID:0000-0001-7281-5450,邮箱:85381107@qq.com



出了关于“目录之学”的另类叙事,并赋予了目录在学术文化上的能动作用——目录可以能动性地改造三代以降的学术之“流”,使其上达“三代盛时”之“源”的理想境界。章学诚不仅要解释学术世界,还要改造学术世界。

相应地,古代目录在学术文化上的能动作用,也成为该书重要的创新性内容。作者指出,“文献世界及其文化体系是存在于书目清单之中的,只有通过书目,一种文化模型的要目才能清晰地显现出来,书目结构因而也成为人们认识和接受文献与文化的必由之径乃至文化的认同机制,影响到人们对学术文化的接受和理解”^[7]。正如作者引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一书中的观点指出:“古今总校书之任者,皆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8]换言之,古代目录并不是文献整序的工具与消极表述或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而是对文化的确认及其对文化特权的强制性分配体系,表达着特定的思想与观念,体现出“衡量学术文化的自我尺度,从而也构成了一种极大的能量,左右着人们的文化理解”^[9]。因此,古代目录固然是传统文化规约下的产物,但也以书目自身的结构与形态表达文化主张,直接参与民族文化精神与思维模式的建构,文化问题甚至可以直接归结为书目问题。

目录作为文献及其背后文化的编码系统,创造了一种自主的思想体系,其组织方式广泛涉及社会政治、心理思维等问题,大量文化认知尤其是关于文化系统的知识是通过目录获得的。对古代目录学原创性的深度剖析,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和精神内核的剖析。借用目录系统和范例来解释文化现象和分析社会文化系统,不仅有助于认识文献类型和文献秩序,也有助于对文化事实做出清晰的梳理,甚至能够获得书目所指向的文化理想。书目的秩序性遂成为文化的规定性,人在进入书目的同时也进入了一种文化,编制和使用书目就是在进行着生生不息的文化认同工作。例如,《四库全书总目》以书目的形式对典籍进行考据和再阐释,固然是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提倡实学的产物,但《四库全书总目》作为典籍的整序模式,也是一个文化评估体系。它通过对文献的描述及其组织关系的确立,不断调整着人们对古籍的认知方式,影响到人们对汉唐考据之学的接受以及对宋明理学的反思。

进一步而言,中西目录的差异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立足于目录差异,也将“产生高度概括性的文化对比成果,反证跨文化研究的一些结论”^[10]。比

如,比较中西目录学的异同,可以揭示中西方不同的思维特征乃至天道观的不同取向。由此,目录也成为观察世界、解释经验的特殊手段,不同民族的认知方式与行为方式在各自的目录学中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与说明。甚至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颠覆世界文化的西方中心主义一元话语,也不再只是文化课题,还是目录学研究无可回避的课题。

1.2 古代目录的技术和知识都统一于信仰

《文献著录总则》(GB/T 3792.1—1983)反映了西方“智性”文化规训,相应地,现代文献被定义为“记录有一切知识的载体”,只有与观察事实有逻辑联系的问题才成为研究的对象,现代目录也只需要对文献的外部形态和知识论内涵的刺激作出反应。相比而言,“申明大道”的超越旨趣,则是“仁式”的崇尚道德理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代目录学上的反映。其基本思路是,“记录传统文化的古代文献,不仅是表面的物理形态和学科化意义上的知识论之‘文’,更是深层的价值存在之‘献’”^[11]。“知识”并不是打量文献的唯一视角,读者如何突破知识论的表象而触及文献的精神与意义,才是先贤思考的重点。因此,“弘道”的价值要求高于“求真”的知识要求。古代目录与其说是文献的客观知识序列,毋宁说是一种关乎人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精神结构与文化系统。这不仅意味着理想境界是中国古代目录学追求的一个特殊方面,还意味着有关技术和知识的内容最终也必须统一于作为信仰的“申明大道”。

首先,“甲乙部次”之“技”必须进之于“道”。

正像庄子“庖丁解牛”的典故所揭示的那样,形下之“技术”必须上达“依乎天理”之“道”。《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也是要揭示:信仰高于知识,知识高于技术,人伦大道之信仰,才是判断文化现象的根本标准。因此,中国古代先贤并不为学术而学术,学术是为人伦教化之道服务的。同样,古代目录学中“甲乙部次”的技术也不能被提纯出来独立精进。例如,明代官私书目多重分类检索,但主流分类仍以四部体系为圭臬且多首列“制书”,直接回应了传统文化重经史、轻子集的学术主张以及对皇权崇高地位的确认。说明作为技术的分类,必须与学术类别以及政治教化与人伦彝常的整合达成共识,才能确证自身的合法性。正如我国台湾学者周彦文指出:“中国历代书目的编制者,并没有去思考‘书目’和书架上庋藏的图书顺序有什么关系。他们所考虑的,一是如何将图书‘学术系统化’,二是如何在书目中传达出教化思想。”^[12]

其次,“学术考辨”之“知识”必须以“申明大道”



为指向。

如上所述,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命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源流”的疏浚,使“三代而后”之“流”的学术回归“三代盛时”之“源”,而后者乃是华夏文明的“大道”之所存。因此,目录通过著录一批文献并对文献进行分类和概括,表面上是为了实现对文化的区分与整合,本质上是反思文化,使之归趋于形上之“道”。例如,《七略》的目录工作表面上是“总群书”、条理文献,但本质上是要回应“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书·艺文志序》)的文化失序的挑战,回归“仲尼法度”才是刘氏父子目录工作的根柢。这决定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并不固步自封地局限在‘术’的形而下层面,而是密切联系社会政治和人伦生活,具有‘道’的形而上追求,成为入世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13]。目录学家通过对文献的定位以及对文化的规范,确立了目录学的人伦价值取向,从而完成对文献秩序和文化秩序的本体论勾勒。

显然,基于内容的古代目录学研究,本质上就是以“申明大道”为导向的研究,它同人格修养与社会和谐密切相关,所以层次更高。然而,学界往往习惯于将古代目录的形式结构和内容旨趣作一一对应式的细则化分,我国台湾学者胡楚生即认为:“目录体制,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亦名解题或提要),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14]事实上,古代目录中的每一项形式结构都同时具有检索文献、考辨学术和申明大道的功能。例如,分类固然首先是为组织和检索文献,但也是考辨学术和申明大道的利器。郑樵《通志·校讎略》即认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而藉由分类得以呈现的学术结构又直接对应于政治教化和人伦彝常的理想秩序,具有“明辨是非”的超越指向。

综上,“内容决定形式”的基本要求决定了古代目录的任何形式都必须围绕其内容来展开。而古代目录的内容细析有三,浑言则一,事实性的技术和知识都是“器”,必须服务于作为“道”的价值内涵,围绕客体对象的研究成果只是“小道”或“奇技淫巧”,它们必须奔赴于价值内涵的最终目标。因此,古代目录的本质即在于如何选择适当的书目形式,将文献的价值内涵标引和组织起来。基于这一思路,《研究》一书中的主体部分(第三章和第四章)即致力于分析古代书目中的著录、提要、分类、类序乃至案语、尾题等形式要素,是如何标引或组织文献之“献”的

价值论内涵的。相应的,以内容为逻辑起点的研究,强调中西目录学之间的“异”大于“同”。拒绝以西方学科化范式限制古代目录,也成为《研究》的又一个亮点。

2 古代目录形态结构的学术创新

古代目录的著录、提要、分类、类序等形式要素仍然是《研究》的讨论对象,但具体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则突破了陈规。例如,改题书名的现象,早就为学界所重视,章学诚曾总结出“盖古人称名朴而后人入于华也”和“盖书名本全而援引者从简略也”^[15]等规律。《研究》则进一步分析了一个被学界所忽视的原因,是出于强调某“类”文献同质关系的需要而改易书名。例如,在《汉志》“六艺略”这个类目中,易类有《易经》、书类有《书经》、诗类有《诗经》、春秋类有《春秋经》,相应地,礼类中的“《士礼》十七篇”也被改题为“《礼经》十七篇”了。同理,礼类中本名《周礼》的文献,被改题为“《周官经》六篇”,也是考虑到与“六艺略”其他相关文献著录的一致性。章学诚曾经献疑:“《淮南内》二十一篇,本名为《鸿烈解》,而止称《淮南》,则不知为地名与?人名、书名与?此著录之苟简也。”^[16]事实上,《鸿烈解》之被改题《淮南》,正是出于“诸子略”文献以人名书的统一性的考虑。显见,章学诚虽究心于书名改易问题,但因未能洞察基于同质关系而改题的事实,才轻言《汉志》“苟简”的。进一步,作者还在大量例证的基础上总结指出,“改易书名现象的普遍存在,表明实然存在的文献并不是绝对的‘客观’对象,而是根据主体的认识呈现出随变而适的‘主观’特征,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人文性”^[17]。又如,作者指出:“刘向叙录首先是上行文书,即东汉蔡邕《独断》所谓‘群臣上书于天子’的行政文书”^[18]。唯其如此,叙录亦称“叙奏”。“上行文书”才是叙录更为重要的身份标签,从而也颠覆了从“书目提要”解读的常识性视角。正是在“上行文书”的意义上,叙录“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的意识形态指向才能得到落实^[19]。

《研究》一书中类似上述的学术精见堪称层见迭出。但“分类”才是古代目录最重要的形态要素,正如汪辟疆指出:“研究目录学之标准,当必博稽其源流,商榷其类例,与夫义例之变迁,分隶之出入,皆宜详究。”^[20]因此,关于分类研究的学术创新,也构成了《研究》的重要面相。

首先,严格区分中西分类的异同。

现代西方式的分类本质上是形式逻辑分类,现代



书目也通过明确的类名范畴和抽象性的分类标识符号,建构出一套关系外显、法则繁琐的描写主义的形式体系,“一类”文献成为具有同一学科属性或主题逻辑的集合。尽管同类文献事实上存在“个性”,但都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要求下被忽略了。这种基于逻辑判断的类别划分,恪守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客观规则,很少有言人人殊的自由发挥空间。

中国古代书目分类疏通、空灵、不滞于形,而是以意统形、心凝形释,努力建构出一种削尽冗繁的意义结构。这跟古代文献的价值论定位有关。价值是一个主体范畴,分类固然要受到文献的客观知识论内涵的制约,更要受到主观之“我”即个体主观见解的制约,目录的结构问题也变成了目录的表达问题。因而,类别时刻准备向人伦妥协,牺牲逻辑亦在所不惜。例如,《四库全书总目》“书类”末论及蔡沈(1167—1230)《洪范皇极数》时指出,该书“虽以《洪范》为名,实以洛书九数推演成文,于《洪范》绝无所涉,旧以为书类,于义殊乖。今悉退列子部术数类中,庶不使旁门小技淆乱圣经之大义焉”。这里,《洪范皇极数》“旧以为书类”,正是执着于知识论分类的结果。但“书”这个二级类目是从属于“经”这个一级类目的,一级类目“圣经之大义”的价值内涵决定了《洪范皇极数》不能列入“书”类。

显然,古代分类旨在培养人伦教养,获得心学良知,书目不仅属于认知的领域,还属于价值的领域。分类的过程既要了解可形式化的文献之实物、性质、事件等,还要了解不可形式化的价值和意义,其总体精神是倾向于放弃西方式的知识论与形式逻辑。杜定友认为:“自来部次图书,首重类例。类例者,犹今之分类也。”^[21] 吕彼得、潘美月曰:“所谓的‘类例’,即是现今习称图书的分类。”^[22] 对中西分类的这种简单化的类比,显然没有认识到两者的本质性差异。

其次,中国古代目录中的类名和标识。

对类名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作者则指出,“类名是分类表的基本结构本位,类名的选用及其组合规律凝聚着分类体系的基本特征。”^[23] 因此,对类名的研究也是《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总体上,古代目录的类名疏于定义,往往从外延出发提示类别的可能范围,即从现象解释本质,以抵消因缺乏定义而导致的认识模糊。例如,《汉志·兵书略》“技巧”类序云:“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这里,班固没有对“技巧”予以定义,而是从“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的外延角度揭示“技巧”的可能意涵,并最终落实为“以立攻守之胜

者也”的功能归宿。其中,“习手足”是指技能训练,“《手博》六篇”等文献属此;“便器械”是对兵器使用的训练,“《剑道》三十八篇”等文献属此;“积机关”是对攻守器械的备置,“《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等文献属此。“技巧”类名不是以客观主义和逻辑理性为原则生成的,它更像是一种征候或象征,而不是抽象的符号。由此又带来了古代类名的另一个特点,即往往直接源自某个具体的文献之名,如“易”“诗”既是具体文献(《易经》《诗经》)之名,也是类名。不仅如此,古代书目中的类名一般都有一个与之直接相关的具体文献。《唐六典》卷10《秘书省》曾简介《隋志》中每个类名的可能含义,但又以附注的形式,举出各个类目的代表性典籍。其曰:“甲部为经,其类有十:一曰《易》,以纪阴阳变化(《归藏》等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二曰书,以纪帝王遗范(《古文尚书》等三十二部,二百三十七卷。)……”这里,“一曰《易》,以纪阴阳变化”,以“《归藏》等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为注脚;“二曰书,以纪帝王遗范”,以“《古文尚书》等三十二部,二百三十七卷”为注脚,都通过具体文献(如《归藏》)来辅助说明类名(如“易”)的内涵。事实上,“古人使用的‘类例’这个词中的‘例’本身也有举例的意义,即通过特色化的文献点明‘类’的内涵,起到示范意义”^[24]。“类例”(而不是西方式的“分类”)通过代表性文献之具象,使得类名概念生动可感而又有所依托,类名的有限概念化也因结合具体文献而做出了感性的渲染。由此导致古代类名拥有一张诗意的面孔,是一个非逻辑化的、不清晰的概念,而这又是与古人的思维相统一的,从而也保证了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同构关系。

与类名一样,分类标识也鲜少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研究》则指出,“现代分类一般都在类名的基础上配置了由阿拉伯数字和/或拉丁字母组成的标识符号,文献组织可以分析为类名标识的纯粹符号系统,从而也强化了类名与文献的逻辑性”^[25]。中国古代并没有类似的纯粹符号化代码,这无疑与类名的非逻辑化特征直接相关。《汉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主流目录没有分类标识,但另有一些古代书目以甲乙干支或者“千字文”为号,后者的共同特点是不像阿拉伯数字与拉丁字母那样具有明确的边界,这跟古代文献不具有明确的逻辑边界有关。古典文献是一个主体性的价值存在,在内容上没有“非此即彼”的知识论明晰性,只能对它们做出主观的灵活流动的整体把握。换言之,模糊性的文献,导致了模糊性的分类组织建构,而后者又导致标识不可能选用



具有明晰性的代码符号。与之形成对照,代码标识是现代分类的科学主义精神相适应的,它从原子切分的角度观察和描述文献,而这又得益于现代人对具体文献在类别归属上非此即彼的逻辑预设。相应地,现代分类能够建构出一套同样具有非此即彼特征的标识符号,以便在具体和个别化的水平上掌握对具体文献的描写和标引,并进一步上升为模拟化的层次,认识和把握文献乃是通过符号范畴的一种间接化的处理过程。

再次,重视历时性的次序而不是共时性的结构。

自《汉志》将文献分为六略(大类)、三十八种(小类)以来,建构多级类别体系一直是古代目录的努力目标。《研究》则指出,“古代目录中的类名虽有等级之分,但文献只能被分到一个类系的最下位类目之中”^[26]。例如,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小学(训诂、字书、韵书)]}中,只有最下位类(训诂、字书、韵书)具有安置文献的职能,如《尔雅》入“训诂”、《说文解字》入“字书”、《广韵》入“韵书”,而没有任何文献被直接安置在“经部”或“小学”等可以划分出下位类的类名之下。因此,文献主题并不随类名而作形式逻辑类项上的划分,因而也不具有等级和从属关系。1898年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生理门第一下列“生理学”小类、文学门第十一下列“文学”小类、美术门第十三下列“美术书”小类,正是为了解决上位类目不能安置文献的现实才重复设置的。这也说明,被视为“近代书目”的《日本书目志》,仍与传统书目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古代书目注重先后位置的选择,文献呈现出一种线性平面的排序关系,这与西方式的等级立体结构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指出,“理性是西方目录学的最高价值目标,其他价值都是理性价值的具体化,所以,文献及其关系是作为‘客体对象’予以认知的”^[27]。因而,文献的内涵由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概念因素构成,概念因素的增加或减小形成新的概念,概念内涵与外延成反变关系,通过这些性质可以划分或概括出概念的隶属关系和并列关系,建立严格等级谱系化的分类体系。而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儒家伦理,古代书目的各个方面和环节都渗透了儒家的伦理精神,其他价值都是伦理价值的具体化。这决定了文献组织不能机械地固定在某一点上,形象地说,文献不能端坐到一把把逻辑化、学科化的窄小的直背椅上。相应地,古代书目分类的组合方式也不是立体化的机械结构,而是通过先后顺序的经营表达深层意义,由此也补偿了理性的缺失。例如,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

·史学第七》类序云:“先以正史,次以杂史,次以政书。古今成败得失,一张一弛,施之于政,厥有典则,存乎正史。史臣为国曲讳,或有抵牾,尤赖杂史,以广见闻。朝章国典,著述渊薮,举而措之,若指诸掌,则政书尤要。”次序不是树状结构,而是作为一种事理脉络,表达和揭示文献价值的大小。

最后,具体文献对类目设置的影响。

现代逻辑化的类名,表征一组具有共同特征的文献集合,而代码化的分类标识则强化了“类”的逻辑性,若干文献也通过逻辑类项和学科标志进入了类名及其标识的结构网络。但中国古代的类名并不是严格的逻辑范畴,“类”是不具有明确逻辑边界的,同一类目下的所有文献并不是“共同特征的文献集合”,因而其地位是不平等的。例如,《四库总目·目录类序》说金石“无类可归”,从《宋志》附目录类。又如,《汉志》孝经类中的《孝经古孔氏》是该类的当然成员,既维系着类名之“名”与文献之“实”的相对统一,也强化了“孝经”类目的表意性。但该类还包括非典型成员《尔雅》等文献,非典型成员与类名的关系相对松散,从而意味着几乎所有的类名都斑斓驳杂,体例不纯。

反过来说,几乎每一个古代类目都可以划分出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当“随附”的非典型成员蔚为大观,就意味着一个新主题的出现,并有了生成新的类目的可能。例如,《史记》在《汉志·春秋》中是非典型成员,而《七录》因史籍“所撰尤繁”而导致“经传录”类目的增立,并成为后世“史部”的前驱,《史记》也成为“经传录”或“史部”的典型成员。正是“所撰尤繁”的史籍在数量上的增加,导致书目不能回避或无视它们的现实存在。又如,《四库全书总目》设置了“诗文评”类,并以刘勰《文心雕龙》居首,成为该类的典型成员。但《文心雕龙》在《隋志》等书目中是作为非典型成员“随附”在“总集类”的。正如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所云:“晋李充始著《翰林论》,梁刘勰又著《文心雕龙》,言文章体制。又钟嵘为《诗品》,其后述略例者多矣。至于扬摧史法,著为类例者,亦各名家焉。前代志录散在‘杂家’或‘总集’,然皆所未安。惟吴氏《西斋》有‘文史’之别,今取其名而条次之。”这里,“体裁渐备,故文论之说出于焉”,是“诗文评”类目设立的根本原因。这一演变,既体现了“诗文评”从“总集”中独立出来的过程,也反映了“文学批评”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或学科被广泛认可的过程。显然,“具体文献导致的类目变更,也是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不同时代



的文化价值取向”^[28]。

3 结语

致力于学术创新是《研究》一书的最大特色。毫不夸张地说,整部《研究》就是围绕学术创新而展开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学术创新的基础上,《研究》还为中国古代目录学建构了一个符合自身本性、具有充分解释力的学理体系。其核心思想是,文献是目录的对象,在对“文献是什么”这一前提性问题的认识上,中国先贤的思路与现代西方的认知大异其趣。现代目录学把文献当作物理性存在,重视对文献对象的分析与解剖以及对文献客观属性的抽取,由此导致了目录学的学科化建构。中国先贤把文献视为价值论存在,古代目录也从道德理想出发,规划文献(进而规划文化)世界的可能图式,反映汉民族意识中的实用理性精神,也代表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理想。关于《研究》一书对古代目录学学理体系的建构,笔者拟另文专论。

参考文献

- 傅荣贤.中国古代目录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吗[J].图书馆杂志,2002(6):3-5.
- 傅荣贤.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 同2:32.
- 傅荣贤.论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理念的本质[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2):111-117.
-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93.
- 章学诚.校雠通义通解[M].王重民,通解.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4.

- 同2:59.
-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M].老根,编著.中华传世奇书.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20.
- 傅荣贤.论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的当代进路[J].图书馆,2010(3):35-38.
- 傅荣贤.中西目录学比较研究刍议[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9(1):66-70.
- 同2:181.
- 周彦文.中国目录学理论[M].台北:学生书局,1995:26.
- 傅荣贤.中国古代书目中的文献秩序、人伦秩序和天道秩序[J].图书馆杂志,2013(12):18-22,36.
- 胡楚生.中国目录学[M].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5:3.
- 同6:30.
- 同6:112.
- 傅荣贤.基于关系原则的古籍命名考论:以《汉书·艺文志》为例[M].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4):87-91,125.
- 同2:153.
- 傅荣贤.作为上行文书的刘向叙录[J].山东图书馆季刊,2011(6):25-31.
- 汪国垣.目录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11.
- 杜定友.校雠新义(上)[M].上海:上海书店,1991:1.
- 昌彼得,潘美月.中国目录学[M].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69.
- 同2:250.
- 同2:243.
- 同2:244.
- 同2:218.
- 同2:190.
- 同2:239.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扬州,225002

收稿日期:2018年3月6日

On the Academic Innovation of China Ancient Bibliography Research

Tang Liming

Abstract: China Ancient Bibliography Research, is a research-based monograph aiming at academic innovation, which not only includes the innovation of the object of speech, but also the innovation of the content. The former is embodied in the active discovery of research that has not been regarded as academic problems of consciousness research, such as analysis of ancient bibliographic classification, linear order of the same category in typical and atypical literature; the latter is reflect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herent problems, such as the nature of Liu Xiang's narrative "up document", the re-position and the meaning the redefinition of "distinguishing the academic headstream", etc. Regardless what kind of innovation, with the premise of mutual reflection and mutual reading of ancient catalogue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said that China Ancient Bibliography Research is a bibliography of anci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Keywords: Fu Rongxian; China Ancient Bibliography Research; Bibliography; Academic Innovation